

最后的梿枷

丁贤玉

以为超越了农耕时代，以为那些植根于农耕深处的事物需要以追忆的方式才能唤起，其实不然，它们并未完全消失，而是以某种方式顽强地存活者。

上半年，爱人和几个同好相约，作了一次时尚的乡村游，回来的时候，兴奋还停留在她的脸上，她说，今天干农活了，是帮一个婶子打油菜籽。这活儿我熟悉，我猜她一定是用脚踩或用手揉的吧，但她说是，是用一个大拍子拍的——是的，她说的就是“大拍子”，她用手比划着说，往上一举，往下一拍，油菜籽就拍出来了。她还说，这东西要用巧劲，如果再多干一会，我就能掌握住诀窍了，成为一个干农活的高手。这一说，我就知道了，她说的“大拍子”其实叫做“梿枷”。

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耕民族，

梿枷是古老的农具之一。据文字记载，远在春秋时期，齐国人就开始使用这种农具打麦子了，只是那时不叫梿枷，而称“拂”；至于定义为“梿枷”大约在唐代，唐人颜师古《注汉书》曰：“拂音佛，以击治禾，今谓之梿枷”。这样算来，自为梿枷始，这种农具的使用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说来有点怪，不知道梿枷为什么在宋代又被用来作了兵器，只是材料不同，以铁易之，坚实、沉重，一拍之下，便能制敌于死命；只是这种用法持续时间并不长，很快又还原了它原本单纯的用途。我想，梿枷之所以转化为兵器，也许是农耕民族熟悉它的性能吧，稍加训练就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；至于很快又“退役”，可能是这种略显笨拙的兵器在刀枪剑戟尤其是宋末出现的火药面前，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。

梿枷利于农事，脱粒最好，可以打麦子、打油菜籽、打黄豆等。几十年前，梿枷不仅生产队集体有，农户家里也有，都是自己制作

的，以竹或木，主件是手杆和枷拍，以轴相连，用时以巧制动，一抡一压，平行落下，重重地拍打在谷物上。记得最壮观的莫过于集体打麦子，某个晴日的午后，麦子晒干了，铺在空场上，黄灿灿一大片。一群男女间隔一定的距离，排成两排，相对而立，人手一把梿枷，号令一响，梿枷抡起，枷拍转动，齐整整地落下去；两排的动作是错开的，一排打下去，另一排就抡起来，此起彼伏，配合默契；同时，两排人的步伐一进一退，一挪一移，也是整齐划一，毫不紊乱。一时间，几十把甚至上百把梿枷在空旷的晒场上下翻飞起，错落有声，节奏分明，像壮观的劲舞，更像是古老的图腾。

现在，常常在老宅里看到一些弃用的农具，比如犁、耙、耘耙、水车、风扇、镰刀什么的，但我似乎从没看到过梿枷的影子，原以为我家的梿枷一定早就消失了，不曾想，就在前两天，我又再次看到了它。那天是双休日，我回家看母亲，走在屋后，老远就听到门前传来



制图 肖婕妤

一阵阵似曾相熟的声音——啪，啪，啪……我很奇怪，不由得加快步伐，转过墙角一看，果然，正是打梿枷的声音。门前空地上铺着一些黄豆荚，我的母亲，一个70多岁的老人，正手把梿枷，举起来，压下去，举起来，压下去，一下又一下，对着豆荚不停地拍打着。看动作，仍是那么娴熟，那么连贯而舒展，这情景，突然让我我心里一热，恍若穿越，似乎又看到了几十年前的母亲。

那天中午，母亲不但炒了一碗刚打下的黄豆给我下饭，临走时，还把剩下的黄豆都装了，硬要我带回城里吃。母亲说，一年到头都花你们的，从来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们……听

了这话，我顿时觉得脑子不够用了，久久地，我说不出话来。一直以来，我以为能常回家看看，送些吃的用的，就是尽了孝道，其实仔细想想，我所做的，只不过是不断地靠近母亲，而从没有走进过母亲的内心。母亲并不是要找回自尊，而是在极力寻找每一个疼爱子女的机会。接过这不多的黄豆，我无法掂量它的分量，更无法以当下的市价估量它的价值，这是我年老体弱的母亲亲手种的，挖地，平整，下种，浇水，施肥，采摘，翻晒，直到用梿枷一下一下打出来。

再看那梿枷，依旧靠在墙角里，容颜已老，默默地融入自己的岁月里。

一辈子，认识多少人？

王太生

一辈子认识多少人？大多都是朋友、同学、同事、邻居，和你打过交道的人。

父母大概是这世界上认识最早的人。他们的一张慈爱之脸，是这个世界最美、最丰富的表情。从年轻到衰老，始终印刻在岁月记忆的深处。兄弟从小手足砥砺，面面相觑。儿时虽不懂事，互相之间还曾调皮打过架，拖着鼻涕，四目圆对。你生命中的那个人，不早，也不晚，认识在杨柳树下。两人相互凝视，有一搭没一搭说话，一会儿抬头看天。

几十年，与多少人有过交集？朋友王老大，在他50岁生日那天请108个人喝酒。这108个人，是王老大认识的人。这些认识的人，每一个人与王老大相识，都可以讲一段故事。108段故事，就成了一个人的“水浒”。王老大每个月有几天要参加各种聚会，有老同学聚会、老同事聚会、老牌友聚会……大伙儿轮流做东，经常见面，能够坐在一起的，就构成一个圈子。

一个人，认识许多人，相处是件很难的事情。既不能张扬，也不能得意，既不要过分谦卑，也不要强势。我的外公，活了86岁，一辈

子却没有和谁有过仇怨。外公性子慢，与人和善，倒头即睡，从不把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放到心里去，他的那些朋友与他相交几十年，直至他生命的离去。外公在世时曾对我说，我不行了，一定要记得去喊城门口的蒋爹，他和蒋爹在18岁时就认识了，交往几十年，后来在外公弥留之际，我去喊来蒋爹，这个与外公相交60多年的老友，抚摸着外公的头顶，神情伤感地说：“还是热的……”

恩人和仇人，也是你认识的人。爱与恨，有时也很天真。若干年前，一个朋友对他的上司有恨。他在中午往人家打电话，拨通后响三声便把电话挂了，“中午往他家打电话，把那小子的午觉给搅啦。”为何不选择夜半三更打电话？有一次，酒醉，朋友道出原委：“夜半三更，会把那小子和大家子给吓着。”

认识的人，开始只是认识。后来，有的人成为朋友，有的人成为竞争对手，有的人彼此并不合拍，从此渐行渐远。

南岭，中国南部最大山脉和重要自然地理界线，横亘在湘桂、湘粤、赣粤之间，向东延伸至闽南。地处南岭山脉南部的韶关市是广东省北部的一个地级市，这里是北江上游，浈江、武江、北江三水交会处，与湖南省、江西省交界，毗邻广西。韶关人均拥有土地资源、森林资源、矿产资源居广东省地级以上市第一位，被誉为华南生物基因库。

从北京坐高铁8个多小时到达韶关高铁站，再坐大巴车赶往仁化县的路上，道路两旁的山脉让我一点也没有来到中国南方省市的代入感。这里的山没有江南的秀气，没有西南的温润，倒有一些北方山脉的粗犷。高大巍峨的山脉，层峦叠嶂，道路两旁的树木倔强地依山势往上生长着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实则生机无限。有那么一刻，我以为自己来到的不是祖国南部，而是大西北的延安。是的，这次来韶关的任务就是重走长征路，眼中所见难免会与脑中所想结合起来，而之前我过去的最“红色”的地方就是陕西延安了。

1934年10月至11月，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被迫实行战略转移，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长征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，10月中旬进入广东，经过南雄、仁化、乐昌和连县，突破国民党在粤北设置的三道封锁线，于1935年1月胜利横跨粤北，进入湘境后继续长征。红军在仁化境内行军作战10天，甩掉了敌人的追击和堵截，进行了奇袭城口和铜鼓岭的战斗，摧毁敌人设在仁化县境内的碉堡2座，突破了国民党军设在城口至桂东间的第二道封锁线。

据史料记载，当时的广东军阀与蒋介石军队有矛盾，而红军从江西过来又很便利，利用天时地利和人的条件，红军部队放弃北上湘西北的计划，暂时避开了敌人的伏击。大概是因为这里没有经历硝烟弥漫的战争，所以当地人对红军路过此地的事情也一直不太放在心上。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周建平介绍说，1973年他来这里下乡时，问起当地人红军长征的事情，人们大都回答不上来。

直到近几年，人们才开始一点点回忆起那些年的红军事迹来。有的听长辈说曾拆下过门板给路过的红军歇脚，有的说曾捐稻草给红军休息，但大都因为年代久远，拆下的门板早已不知所踪。说到这里，同行的记者们，无不为之遗憾。

我注意观察解说员萧生奎的表情，他始终笑着面对大家，有些局促，又不免紧张。一张黝黑消瘦的脸庞，让我不禁联想，也许，80多年前，他的奶奶和大伯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军时，大概也曾有过紧张吧，当看到红军对他他们秋毫无犯时，淳朴的他们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情，并没什么大惊小怪。那一

夜，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，只不过是无数日夜中普通的一夜罢了。然而，在中国解放的道路上，却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

在仁化县城口镇正龙街，一条狭长的巷子入口处的墙上写着：“红军长征露宿地：1934年11月初，长征红军占领城口后，对群众秋毫无犯，纪律严明，宁在此露宿街头，也不占民房。”史料记载，1934年11月初，红一军团、红九军团等红军主力过城口时，在正龙街露宿。是月5日，国民党衡阳航空队受蒋介石命令飞往城口，对红军实施侦查和轰炸。正龙街口等地遭到疯狂轰炸。炸毁民房5间，炸死居民10人，伤1人。整体的红军战士迅速行动，抢救受害群众，救治伤者，掩埋死者，上门慰问伤亡家属。

据史料记载，1934年11月初，红一军团、红九军团等红军主力过城口时，在正龙街露宿。是月5日，国民党衡阳航空队受蒋介石命令飞往城口，对红军实施侦查和轰炸。正龙街口等地遭到疯狂轰炸。炸毁民房5间，炸死居民10人，伤1人。整体的红军战士迅速行动，抢救受害群众，救治伤者，掩埋死者，上门慰问伤亡家属。

国家动乱，百姓遭殃。在那个战争年代里，最无助的就是百姓。面对荷枪实弹的强大军队，面对敌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，百姓心里一定有一杆秤，谁才是人民的军队？如今的正龙街头，早已没了当年红军的足迹，我们只能靠想象来还原，困极累极了的红军和农躺在街口巷子里的情景。在正龙街口，我看到了吃完午饭正在休闲娱乐的人们，他们的眼神是安详的，过着悠闲缓慢的乡村生活，我问一个小学生：“你知道红军长征吗？”小姑娘回答：“知道啊。”“从哪里知道的？”她腼腆地笑笑：“老师上课讲过的。”再打算追问的时候，小姑娘一溜烟地快步走开了。

我想，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吧。重走长征路，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是一次探寻历史的机会，也是一次自我思想提高的机会。而路过这里，却不惊扰这里的百姓，我想，这就这是我此次重走长征路最深刻的体会。为人民服务，记在心里就好了。没必要在嘴上嚷嚷，您觉得呢？

谢。”沈清唯唯允诺，收下了银子。

第二天，县官果然喝令对霍宪之用刑。沈清一声答应，便左手握着杖杆，右手拿着那十两银子，举着对县官说：“原告用这十两银子贿赂我，叫我将被告毙之于杖下。我不敢用官府的这根杖棒卖钱，特向大人禀告。大人吩咐的杖数我照样打，一记也不会扣；不过，这银子是不是请大人替我转还给原告？”当着满堂吏役及围观百姓的面，县官不由得满面羞愧，只得吩咐暂且将“犯人”押下。

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全县，人们议论纷纷，都知道霍宪之是无辜的，而县官则必然受了李家的贿赂。县官迫于舆论，不得不释放了霍宪之，李权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。

沈清在衙门多年，逝世后，揭阳百姓为了纪念他，就在城隍庙东边的走廊上替他雕了一尊塑像；仍然是左手执杖，右手持银，身穿青色的差役之服，不但栩栩如生，而且自有一股令人敬畏的凛然正气。县里的百姓如果牵涉了什么事情要进衙门，总要带上酒啊肉的，来到沈清的塑像前祈祷。据说，还颇灵验呢。

审美的维度

欧阳

在我们被接受的教育体系里，有过宗教并不美好的日子，欺骗色彩涂抹是免不了的，甚至有“毒药”的说法。这不只是东方特色，西方也有相关的各种“主义”出没。

这是思想领域。而在审美范畴，比如绘画的轨迹中，“宗教”给人的面目却几乎是相反的。不仅是莫高窟的壁画，昔日统治西洋的古典主义画作也是如此：祭坛画就不说了，各种壁画，以及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布面油画，像米开朗琪罗、安格尔等大师遗作都是如此，而达芬奇招人的“蒙娜丽莎的微笑”之所以神秘，兴许就和宗教的神性有关，就如专家们猜测，画的背景一定有神秘宗教寓意。当然了，这要看您愿意用何种立场解读了。

如果没有宗教训示，或“教海”，艺术的审美情结或者说超世俗的心灵寄托，这种解读艺术的“理论”成就可能就不会彰显，史上的大师们将无以凭借，诸多震撼人心之力作也将是苍白乏力的——与其说是审美，不如说是寄托。

宗教给了我们超越维度的梦想：世界是“静止”的，人们把时间凝结在静态的空间中，企图以此构建审美对象与人的稳定关系。这在西方留存的油画仓库里痕迹明显，东土图画的“禅意”及“衍生”出来的意境也是这样。

在浪漫主义和各种流派闯荡江湖之后，俗人成角，表现形式也随之变化，各种企图超越的冲动随之而来，无论是自然的模仿，还是心绪的投射，艺术家们一直在有意识地努力，希望用自己的视觉窥探世界。

艺术家们也许没有意识到，他们超越的不是表现形式，而是那个捆锁理性的现实世界，是在做无意识（潜意识？）的挣扎，比如，大师们意欲跨越的也许是空间，或许还有时间的鸿沟。

从有意识的艺术活动开始，刻意的行程是二维的，所有平面图景的展示，虽有所谓透视法则，像西式的单向眼光和东方的多点视界，即使加上油彩的隆起和堆积，各式各样的绘画成品始终都是二维的——人们在积蓄突破平面世界的能量。

在现实的模仿和想象对象成熟并趋于死亡之后，出于发现新世界的好奇心，感觉和直觉的因素有意识地介入进来。作为情绪，也是意识化的心灵，克里姆特的情色，达利的梦幻，以及野兽派的恐惧，都有这方面的努力。然而是零碎的。

另一方面，人们认同印象派执迷光影是因为对瞬间印象（感觉）更有兴趣，然而仔细想想，不是对时间的追逐吗？不是企图展现超三维（时间之维）的视野吗？这个当然是不成功的。观者是看到了普罗旺斯时序延展中的阳光跃动，但这只是作者无意识的冲动，是不自觉的，否则高更就不会回到纯粹的“平面”，也就是二维的再发现中。

立体主义无疑做了在平面上表达三维意图的尝试，他们成功了吗？我觉得很难说。再后来的杜尚更进一步，他在超三维的意指下构建的蓝图——“下楼梯的裸体女人”，最终给出了四维的运动意念，但依旧没有摆脱制约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杜尚彻底放弃了“有形艺术”，转而成为抽象逻辑（另一类艺术）的俘虏——国际象棋大师。

绘画艺术应该是有维度的，但似乎很少有理论家给出明确表述。作为近亲，基于电影的想象超越了吗？如3D，倘若人们确能感觉到有多维度的重建，那也只是想象。实际上艺术如果可以表现流动性，也只能是投射在心智中的摄影。

比较起来，三维似乎可以有，像雕塑，但雕塑仍然是不动的。艺术作品本身应该是活的，即时间上的延续是必须的——如若希望作品动起来的话，否则就会失去纵深的维度。人只能像蜡烛映照一样来审视世界，真是有些遗憾。

可能就是这样的原因，才有行为艺术的出场，然而行为艺术是艺术？如果是，那么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，就如约瑟夫·博伊斯所说，那就没有艺术家，艺术将失去寄主。

审美有维度吗？也许，在表面光鲜的图景里还有不知道几维的心智画卷，同样面临着难以表现的难题，为此而心智浑浊的画家还会像康定斯基一样乱泼油彩。

或许不是因为艺术的表现手法、方式问题，而是人本身无法超越（想要超越）的那个“维度”，就像宗教（当然不是原初意义的某个派别）。和教义本身的关联不大，作为信仰，可能是难以超越的；那是一个超维度的世界。



在韶关，重走红军长征路

周倩

在仁化县长江镇，我们探访了曾经作为

红军长征期间露营地的陈欧营下村。村头一棵360年树龄的小叶榕树旁边竖着一块碑，上面写着：“红军长征经过仁化旧址陈欧营下村”，下面详细记载着：红十五师（少共国际师）于1934年11月3日进入长江，沿前面部队的路线一天赶到陈欧，当夜在营下村宿营。1962年出生的萧生奎告诉我们，据他奶奶和大伯讲，当年彭德怀的部队就住在他家，“红军来之前，百姓们都不知道，他们从老百姓处买吃的，给钱，给的比市场价格还高一些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当时的广东军阀与蒋介石军队有矛盾，而红军从江西过来又很便利，利用天时地利和人的条件，红军部队放弃北上湘西北的计划，暂时避开了敌人的伏击。大概是因为这里没有经历硝烟弥漫的战争，所以当地人对红军路过此地的事情也一直不太放在心上。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周建平介绍说，1973年他来这里下乡时，问起当地人红军长征的事情，人们大都回答不上来。

直到近几年，人们才开始一点点回忆起那些年的红军事迹来。有的听长辈说曾拆下过门板给路过的红军歇脚，有的说曾捐稻草给红军休息，但大都因为年代久远，拆下的门板早已不知所踪。说到这里，同行的记者们，无不为之遗憾。

我注意观察解说员萧生奎的表情，他始终笑着面对大家，有些局促，又不免紧张。一张黝黑消瘦的脸庞，让我不禁联想，也许，80多年前，他的奶奶和大伯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军时，大概也曾有过紧张吧，当看到红军对他他们秋毫无犯时，淳朴的他们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情，并没什么大惊小怪。那一

夜，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，只不过是无数日夜中普通的一夜罢了。然而，在中国解放的道路上，却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

在仁化县城口镇正龙街，一条狭长的巷子入口处的墙上写着：“红军长征露宿地：1934年11月初，长征红军占领城口后，对群众秋毫无犯，纪律严明，宁在此露宿街头，也不占民房。”史料记载，1934年11月初，红一军团、红九军团等红军主力过城口时，在正龙街露宿。是月5日，国民党衡阳航空队受蒋介石命令飞往城口，对红军实施侦查和轰炸。正龙街口等地遭到疯狂轰炸。炸毁民房5间，炸死居民10人，伤1人。整体的红军战士迅速行动，抢救受害群众，救治伤者，掩埋死者，上门慰问伤亡家属。

据史料记载，1934年11月初，红一军团、红九军团等红军主力过城口时，在正龙街露宿。是月5日，国民党衡阳航空队受蒋介石命令飞往城口，对红军实施侦查和轰炸。正龙街口等地遭到疯狂轰炸。炸毁民房5间，炸死居民10人，伤1人。整体的红军战士迅速行动，抢救受害群众，救治伤者，掩埋死者，上门慰问伤亡家属。

国家动乱，百姓遭殃。在那个战争年代里，最无助的就是百姓。面对荷枪实弹的强大军队，面对敌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，百姓心里一定有一杆秤，谁才是人民的军队？如今的正龙街头，早已没了当年红军的足迹，我们只能靠想象来还原，困极累极了的红军和农躺在街口巷子里的情景。在正龙街口，我看到了吃完午饭正在休闲娱乐的人们，他们的眼神是安详的，过着悠闲缓慢的乡村生活，我问一个小学生：“你知道红军长征吗？”小姑娘回答：“知道啊。”“从哪里知道的？”她腼腆地笑笑：“老师上课讲过的。”再打算追问的时候，小姑娘一溜烟地快步走开了。

我想，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吧。重走长征路，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是一次探寻历史的机会，也是一次自我思想提高的机会。而路过这里，却不惊扰这里的百姓，我想，这就这是我